

我接待过的几位革命老太太(2) ◆ 邱根发

王光美 主动提出跟我们合影

2001年4月29日,王光美同志来上海体检,在东湖宾馆住过一周。可能就是那次体检,她被最后确诊为癌症。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人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由她的侄女及一个阿姨陪同着,但她对工作人员仍然非常客气,总是一脸微笑,看得出是位善良而随和的老人。出于对她老人家的尊敬,以及对她与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的无限感慨,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接待她的过程中分外仔细,想让她在上海过得愉快些、自在些。按照接待标准,每餐四菜一汤,我们知道她是北方人,尽可能安排了一些面食,菜肴清淡,富有营养,不能太甜。这期间,她的儿子刘源来东湖宾馆看过她,但是并没有惊动上海市的领导和招待处的负责同志,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那时刘源已经是全国武警部队的政委,但他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不端架子。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我带领工作人员一起去为王光美同志送行时,也许是她老人家看出了我们的心愿,也许她知道以后来沪的机会不多了,主动提出要跟我们大家合影。我们激动不已,立刻围拢过来,只是当时不知道她已经身患绝症。她老人家德高望重,拍照时理当坐在正中,但是她却坚持坐在旁边,让别人坐在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在后面站成一排。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五年后在北京逝世。现在每当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眼前就会浮现出当年的情景。



■ 王光美(前左一)及亲友与宾馆服务人员合影

邓六金 性格开朗爱说笑话

邓六金同志是曾山同志的夫人,是参加过长征的27位红军女战士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华东保育院的创办人。她曾在华东地区工作多年,解放初随曾山同志调到国务院工作后,从此长住北京。2000年五六月间,她来上海体检和治病,住在东湖宾馆。老人家性格开朗,思维活跃,对工作人员很随和,有时还说说笑话。她说:“我们家庆红在上海时常麻烦你们啊”,“我们家庆红吃了你们的红烧肉都长胖了……”说话时她笑得很开心。

许多老干部对我们东湖宾馆的红烧肉都印象深刻。记得那时还是黄菊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有一天他与徐匡迪市长一起来宾馆看望邓六金同志,就在东湖宾馆请她吃饭。吃的都是家常菜,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其中就有一道红烧肉,席间大家都赞不绝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老干部都很怀旧,很喜欢吃家常菜,真的要端上鱼翅海参,他们反而会很

反感。饭后,徐匡迪市长已经走出大门了,又返回来对我说:“你们的红烧肉确实烧得好,怪不得许多老同志都夸奖你们。”我对他说:“这是厨师们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红烧肉要用啤酒来烧,肉质就特别嫩。”徐匡迪市长高兴地说:“不错,不错!”看来他也是难得吃上我们东湖宾馆的红烧肉。

邓六金同志很念旧。她与曾山在1952年就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到2000年,已将近五十年过去了,然而她到了上海,总要去看望过去的老同志,还请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警卫员、服务员前来团聚,吃饭。其中有当年的服务员、后来担任国际饭店领导的彭文英,还有兴国宾馆的徐文彪经理。大概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跟她说起过,我很喜欢历史尤其是党史,很希望了解更多更真实的党史资料,于是她一有空就跟我聊党史。老人家对上海感情很深,原本打算在上海住一个月,但是“树大招风”,前来看望她的老部下及亲友们非常多,为了不影晌上海领导的工作,她决定提前返回北京。她那么乐观、爽朗,那次临走时竟然依依不舍,流下了眼泪。

贺子珍 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2004年9月,毛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带着女儿孔东梅也来我们东湖宾馆住过一周,那时她母亲贺子珍同志已经逝世二十年了。孔东梅1972年出生于湖南南路262号她外婆贺子珍的住处(当时是市委招待所),出生后跟外婆一起生活,由工作人员照看,6岁时她父母把她接到北京念小学,这次来上海时已经三十来岁了,住在东湖宾馆一号楼。李敏也非常念旧,把多年来照顾她母亲和女儿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召集过来一起聚餐,并一再向大家表示感谢。她话语不多,偶尔也说起在上海的见闻,说走在大街上,她几次被市民认出来,在一边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还有人喊“毛主席万岁”。

我第一次知道贺子珍同志就在我们身边,是在1981年。那时我刚从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市委招待处机关工作。每月发工资签名时,我发现工资单的最后一个名字是“贺老太”,工资200多元,而且是由招待处的副处长祝小宛代领后亲自送去。当时我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工资是60元,处长葛非同同志是13级干部,也只有200元,怎么一个老太太居然也能拿200多元,而且还由领导亲自送去?于是我开始注意这位神秘的“贺老太”,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志,是12级干部。当时这属于非常机密的事情,谁也不可以随便议论的。

贺子珍同志是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红军女战士,1949年到上海后,

曾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她最初住在溧阳路,后来搬到淮海中路她哥哥贺敏学家住过一段时间。不久,贺敏学调到福建工作,上海市委就在泰安路给她安排了一处房子。鉴于贺子珍身患重病,而且病情不稳定,随时需要医护人员护理,就让她住进了湖南南路262号,当时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招待所。她在这个招待所住了几十年,李敏常来探望她,每年春节总来上海陪她过年。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瘫痪,住进华东医院。此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等她病情稳定些后,在纪念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由李敏陪同前往北京,住在解放军301总医院。这期间,她曾去毛泽东纪念馆瞻仰过主席遗容,了却了她多年的一桩心愿。一年后,她因思念上海,在领导安排下又回到上海,1984年在华东医院南楼病逝。

我虽然没能直接服务过贺子珍同志,但是从一些在她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听到不少她的事迹。当年跟陈毅同志一起进城的炊事班老班长龚庆祥,后来为贺子珍管理过13天伙食。龚庆祥多次跟我谈起,贺子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公私分明,从不多花国家一分钱。她认为国家给她这个老红军的待遇已经很好了,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了,甚至冬天取暖用的煤钱都坚持一定要自己付。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所有开销包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日常开支,也坚持从她的工资里支出。

这些革命老太太的高尚品格,多年来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成为我在工作中学到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2期)

中国赌金者 ——327事件始末

陆一

14.作出开设空仓的决定

于是,以国债司内债处为主,准备了一份包含对1992年国债贴息建议的“1995年到期各类国债兑付方案”的材料,在2月15日由国债司出面向分管副部长汇报。在汇报中,除了新债发行计划之外,在汇报当年到期国债还本付息方案时,针对1992年国债贴息,国债司认为“补了,对1995年的国债发行有利”。

高坚向笔者表示,这个意见还只是初步意见,并不等于最后的决策。因为按照1992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每年国库券的发行数额、利率、偿还期限等,须经国务院确定后由财政部予以公告。但就在1995年初的春节前后,一场围绕着327国债期货合约的风暴,却正由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悄悄地在平静如镜的市场水面之下酝酿。

327是“92(3)国债06月交收”国债期货合约的交易代码,对应1992年发行、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武汉等全国各主要国债期货市场都开设了针对同一标的1992年3年期国债的合约品种。在上海市场,1994年9月30日该品种的持仓量只有5万口。之后,陆续有投资人介入,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力品种。

1995年春节结束恢复开市后,该品种的交易总体呈量增价平之势,2月6日的持仓量为154.77万口,价格在148.10元。这一价位是市场对已经揭示的各种价格构成要素的综合反映,因为1992年3年期国库券到1995年6月底兑付时,发行章程规定的本息之和为128.50元,外加保值贴补20元左右(当时市场普遍预期6月份的保值贴补率约为10%,贴2年时间)。唯一存在争议和不确定的是否会有贴息、贴息率将会是多少。

1995年1月万国证券重组建立交易总部后,从1月18日起,就开始逐步在327上建仓。而在此之前的1994年底,万国证券的国债期货自营基本上是做多。



当时,万国证券交易总部的何忠卿同副手吴德力、廖春晖研究后认为:“政府把抑制通胀列为1995年工作重点之一,并加大了抑制通胀的力度,到1995年1月底,通胀已得到初步控制,同时3月份还将有新券上市。而当时因受保值贴补率不断上升的刺激,327合约在1995年1月12日价格最高曾达148.45元。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按基本分析,327合约当时的价格已属偏高。”基于这种认识,作出了开设空仓的决定。

由于上海证交所对会员单位的持仓量有限制,对万国证券核定最高为40万口(一说为50万口或70万口),包括自营和客户代理。于是,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就给自己寻找了一个借仓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万国证券客户众多,如果按照优先满足客户需要的原则,自营部分持仓很难保证。同时也因为当时市场的交易动态信息基本上是公开的,在本公司席位上一开仓,外界便马上知道了万国证券的操作动向。非但如此,他们还自认为在上海证交所对外借仓位没有明令禁止,市场上借仓现象普遍存在的大环境中,可以同样从众违规借仓。因此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先后在外广泛借用了广发、兴业、海发、京华、安发、财政、华夏、深发等券商期货仓位大量开设空仓。”

同时,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与辽国发的接触中,认为双方在操作策略上基本一致。考虑到辽国发与各地券商关系较好,借用席位及仓位方便,在操作上较为隐蔽,于是双方确定了共同合仓、资金各半、盈亏各半、共同清算的合作方式,并决定从1月23日起分北京和上海两块同时运作。

据被何忠卿派到北京协调与辽国发合作在北京开仓、分仓事务的刘峰嵘回忆:“到了北京以后,在北京营业部同事的配合下,又通过几个朋友的关系在北商所找了几个代理的公司把万国的国债期货账户在3天内全部开出来。开仓以后,上海总部立刻汇来了3个亿的资金,几乎在一周内将所有保证金打到了各分仓经纪公司的账上。按照当时上海何总(何忠卿)的指示,我们很快地就把所有的空仓建立起来了。”

截至1月20日,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327合约上共开空仓25万口。

33.就选姓鲁的当总理

士杰说:“一是四明公所拟出的选举方式,二是广肇会馆拟出的人会资质。商会既是仿照西式设立,亦当奉行西人选举之法。四明公所提议丢豆子,不合西人程式。商会既然涉及沪上所有商帮,门槛就该降低,广肇定下的行帮三百两银子、店铺三十两银子起步交费,必将弱势行帮及店家排斥在外。再说,商会又不是官府衙门,花不了多少钱,收那么多银子做什么?”

“呵呵呵,”丁大人摆手笑道,“士杰呀,你讲的并不完全是。先说这选举,西人是西人,我们是我们。查敬轩提议丢豆子,就是个创新之举,既能表达民意,又简便易行,堪为中西结合的典范,依我看可行。至于这个入会门槛,广肇的提议颇有道理。商会是大雅之堂,不是啥人想进就能进的。但门槛提高了,弱势行帮也当照顾,四明提出的审核、配额制很是不错,不妨试用。”

“老爷讲的极是,”如夫人会心一笑,低声问道,“只是,请问老爷,会员资质当由何人审核、配额又当由何人来裁定呢?要叫我选,介个大拿事,泰记不能置身外。章程既为两家所拟,这资质审核、配额裁定就该当交泰记才是。”

丁大人沉思一时,转头看向士杰,将商会章程草案推过去:“士杰,你把这个拿去,就按方才所议,取两家之长,综合出一份定稿,直接发送道台,就说我已看过了,让他斟酌一下,如果可行,就此照办。会员资质,可由泰记审核,至于配额,交由道台府拟定为宜。”

“老爷?”如夫人不满地盯过来。“夫人哪,”丁大人笑着解释,“配额事体,泰记不出面为好。不过,道台那里我会交代的。我的意思是,可由各帮各行依据章程自行申报,报道台府汇总,由道台府拟定配额底本,交由泰记复审。至于如何复审,就由车总管与士杰操劳,夫人把关。”见丁大人如此安排,三人尽皆叹服。

“还有,”丁大人眉头又想一时,“就是总理人选。”看向士杰,“士杰,依老朽所见,那个姓鲁的蛮有意思,就选他吧!”“老爷,”如夫人最先回过神来,“选姓鲁的当总理,这……未免离谱了吧?”

“是哩,”士杰附和道,“老爷,无论是资产、德望、人脉,都还排不上这人。若是举他当总理,沪上商界难免……”“呵呵呵,”丁大人连连摆手,“商会总理是为商民跑腿的,不能只论钱多钱少。至于德望什么的,这个必须有。什么叫德望呢?公选出来就是德望。只要姓鲁的碗中豆子足够多,啥人能说二话?”

当上海道将官方的章程定案正式颁发至四明时,查老爷子细细看过,眉头许久,接连感叹几声,摇头苦笑。“阿爸,”查锦荣急道,“要不,我去请求一下袁道台,看能否再把入会的门槛降低点。”“关键还不是入会门槛,是这配额。”“配额?”查锦荣颇觉诧异,“配额不是阿爸您提拟的吗?”查敬轩摸出一封信,递过来:“你看看这个,是袁道台写来的。”查锦荣看会儿信,惊道:“这不是让泰记卡住脖子了吗?”“唉,”查敬轩又是一声苦笑,“是呀,我们跟姓彭的争来斗去,结果仍旧落在姓丁的套子里。”“这可哪能办哩?”

“有啥办法呢?”查敬轩吸一口烟,一点点呼出,“胳膊拗不过大腿,我们斗不过姓丁的。”把章程推给锦荣,“召集四明的所有公董,具体商榷选举事体。我就不去了,让公议招呼。”另外,照眼下章程,零售货店都不在列,全部去除后,形势就不乐观了。我初步推算下来,俊逸那儿是关键,他的茂字号十几家店铺都有批售业务,本金也都不下万两,在各行业里虽然不是龙头,却也享有地位。他这人,举足轻重啊!”“阿爸放心,我这就敲打他一下,让他有个掂量。只要是丢豆子,他就赖不过去。”

次日上午,十几个四明公董再聚济元堂。“诸位仁兄,”主持会议的祝合义一脸严肃,“在下奉老爷子之命,讲下有关商会的事体。朝廷批下来了,正式将名称定为上海商务总会。”将上海道颁发并由四明公所大量印制的正式商会章程发给众人,“这就是商务总会的章程草案,请大家过目。”祝合义刻意避开广肇会馆的版本,以显出丁大人对甬商的看重及查老爷子的分量。

大家纷纷低头看章程。这章程他们此前都是看过的,因而众人的目光很快溜到丁大人修改过的部分,面色各现诧异。

第一商会



寒川子